礼源于俗：论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1]](#footnote-1)\*

李乃涛[[2]](#footnote-2)\*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摘 要：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民间文化所特有的自由-自在的特点。民间信仰具有准宗教的色彩，但又区别于民间宗教和制度化宗教信仰，表现出多样性和实用性的特点。礼源于俗，是对道德教化与民间信仰之间关系的判断。民间信仰具有“惩恶扬善”的道德教化功能，具体表现为监视与威慑效应、鼓励与暗示效应。监视与威慑效应是基于神灵信仰的全时空道德约束，鼓励与暗示效应则是基于因果效应的道德引导。在道德教育中，要正视民间信仰的积极意义，要重视道德教育的信仰价值追求层面。

关键词：民间信仰；民间文化；信仰教育；道德教化

***Ritual from Custom: On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Folk Belief***

Li Naitao

( *Center for Citizenship and Moral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

**Abstract:**  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folk culture, folk belief has the same free features with folk culture. Folk belief has the elements of quasi religion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folk religion or institutionalized religious beliefs. Folk belief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and practic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folk belief can be described as ritual from custom.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folk belief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punishing the evil and praising the good.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s for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folk belief are monitoring and deterrent effect and encouragement and suggest effect. The monitoring and deterrent effect is based on the gods faith all space-time moral constraints. The encouragement and suggest effect is based on the causal effect of moral guidanc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folk belief should be confronted. Moral educatio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evel of faith value pursuit.

**Key Words:** folk belief; folk culture; belief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个人成长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个人道德养成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塑造。民间信仰[[3]](#footnote-3)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个人价值观念和道德认知的影响不容忽视。民间信仰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而言，维系着数千年来伦理体系；另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形塑着个人的道德观念。那么，应如何理解民间信仰的丰富性和驳杂性？如何认识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民间信仰的作用机制对学校道德教育有何启示？

# 一、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

民间文化作为民间信仰的母体，是民间信仰赖以存在的根基。民间文化的内容庞杂，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建筑、绘画、雕塑等物质层面的表现形式，也有价值、观念、信仰等精神层面的表现形式。民间信仰就是民间文化的精神层面之一，关注的是个人或集体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若想剖析民间信仰，需先分析民间文化的基本内涵。

## （一）“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自由-自在”[[4]](#footnote-4)[1][2]。民间文化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体现在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自由是生活的本性，生命向往自由。民间文化正是个人或集体在生活中不断形塑的，自然具有了自由的基本特性。民间文化所表现出的自由特性，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首先民间文化的外在形式不拘一格，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比如，民间文学中的歌谣以其形式多样、朗朗上口的特点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而不会像专业文学一样过多地深究其韵律节奏、歌词表达等方面。民间文化的自在特性，主要是指民间文化具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伦理原则和审美趣味，在与国家权力所倡导的主流文化的博弈中，总能坚持民间所特有的立场和风格。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一直将一些民间的祭拜活动视为封建迷信，在宣传态度上采取“反对”或“置之不理”的立场，但是依然没有阻止民间祭拜活动的实际发生。“即便是在文革时期的险恶政治环境之下，百姓们心中仍然惦记着神，希冀这些神灵能为他们及其家庭带来好运。”[3]这就是民间文化所展现出来的自在特性。

“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在我国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道德教化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古代社会被认定为是“礼制社会”。“礼”上连接国家权力，形成一系列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仪式活动（以帝王为代表的国家祭祀、拜谒、庆典等活动），下通达百姓日常生活（人生仪式、起居饮食、节日活动等）。不管是宏观的社会稳定，还是微观的个人成长，“礼”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礼”的产生与民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礼源于俗。

## （二）丰富驳杂的民间信仰

一直以来，民间信仰的性质和地位就颇受争议。在古代社会，民间信仰被视为“ 淫祀”，如在《礼记》中的说法“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4]；《汉书》中进一步解释道“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5]。即使在现代社会，民间信仰也从未被官方所认同，甚至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进行打压。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出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角度，政府部门对于民间信仰的一些活动给予支持，但这并不等于说民间信仰得到了国家权力的认可。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博弈从未终止，这是由民间信仰的特性所决定的。

**1.民间信仰的定位**

虽然对于民间信仰的概念，学术界莫衷一是，但至少有两点基本认识是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首先，民间信仰不同于民间宗教；其次，民间信仰区别与制度化的信仰。具体而言：第一，民间信仰不等同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并不具备宗教所展现出的组织体系、表现形式以及信仰结构等内容。比如，民间信仰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信奉的对象较为庞杂，它所追求的不是彼岸（来世）的幸福而是现实的利益。第二，民间信仰区别于制度化宗教信仰。民间信仰的祭拜没有特定的时间规制，更多的是一种按需祭拜，根据个人的实际需要在重大的人生节点（诞生、成人、婚姻、丧葬）或重大节日（春节、神灵诞辰、清明等）进行祭拜活动。笔者借鉴林国平将民间信仰界定为“准宗教”[6]的说法，将民间信仰定义为：个人或群体相信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个人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自发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的准宗教形态。

**2.民间信仰的特点**

对于民间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一般的解释为“万灵崇拜”和“多神崇拜”。可以说，民间信仰是基于“万物有灵”的思想，体现了普通大众希冀于通过赋予灵性的事物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总体而言，民间信仰表现出多样性和实用性两大特点。

从内容层面来说，民间信仰具有多样性。所谓多样性是指，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涉及万事万物，崇拜对象上具有多样神格和多样神性，对不同宗教系谱的神灵的多重崇拜。从崇拜的对象来看，既有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物（自然力），也有历史人物、神话人物、祖先、鬼神等神灵，甚至还有动植物等，可谓是“万物有灵”。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基本上不具有排他性，可以同时信仰多种神灵，具有多重复合信仰的特色。在北京妙峰山山顶就有一处名为“三教堂”的祠堂，同时供奉着佛教的释迦摩尼、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孔子三尊神像，这样的现象在民间信仰中并不少见。

从目的层面来说，民间信仰具有实用性[[5]](#footnote-5)。所谓实用性是指，民间信仰是按照个人的实际需求来进行祭拜，在祭拜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在诉诸个人的现实需求。俗语所言，“无事不登三宝殿”、“见庙就烧香”等都展现出的民间信仰的实用性。“民间信仰生活中绝没有无缘无故无所需求的祭祀，只要行祭，人们就一定在物质生活上或精神生活上有各种各样的索求。”[7]可以说，民间信仰的目的都与个人现实利益相关，甚至可以采用诅咒他人、损害他人的手段。

# 二、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

民间信仰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主要原因是民间信仰在维系社会发展、塑造伦理规范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民间信仰具有道德教化功能。民间信仰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融合了儒释道的教义教条，“以儒家的忠孝为主，涵盖了佛教的因果轮回，道家的承负报应等信仰伦理，并加以渲染，代代传承，对民众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8]。仔细分析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机制，可以看出，“惩恶扬善”是民间信仰的基本道德原则。即对“做坏事”的惩罚，对“做好事”的鼓励。我们可以用监视与威慑效应、鼓励与暗示效应对这一作用机制加以阐释。

## （一）监视与威慑效应

民间信仰是基于对神灵（万物有灵）的崇拜，相信神灵是存在的，并且个人的言行是在神灵的监视之下。这种无形的力量的监视效应可以用一句俗语概括起来，“人在做天在看”。监视与威慑效应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在力量的约束，二是内在信念的笃定。“天”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有时被称为“上天”“老天爷”等等，所指的对象并不明确，既是一种外在与个人又是与个人紧密相关的存在，个人在遭遇不幸或惊叹时常常发出“我的天、天呢”类似的感慨，基本上可以说明个人与“天”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天”作为一种虚无的存在，没有特指的对象，可能是某种神灵，也可能是一种赋予了灵性的人。个人要相信“天”是一种时时处处的存在，能够监视个人的所有行动，这样监视效应才能发挥作用。这类似于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论述监狱机构的布局时，所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9]，即个人处在一种被监视的状态。个人在“做坏事”（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时，会因担心“遭天谴”而惊慌不已。可以说，监视效应与威慑效应是同时并存的，所谓“头上三尺有神灵”，个人如果做出违反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坏事”，这种神灵的威慑效应就会让个人的内心感到忧虑。“做坏事”在社会学上解释为“越轨行为”，民间信仰的监视效应是将越轨行为置于“未发状态”，通过一种可能的惩罚后果让个人的动机消解。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无疑在结果意义上发挥了道德教化的作用，一方面宣扬了道德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起到了规范个人行为的效果。虽说民间信仰内容驳杂，具有多样性的特点，祭拜的对象五花八门，但是从价值角度分析，民间信仰大多都是督促个人“存善念、做善事、发善心”。

总的来说，民间信仰的监视与威慑效应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全时空性，二是神秘性。全时空性是指个人的被监视状态不会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种“不变”实际上来源于个人内心对信仰的坚定，正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全时空的监视作用突破了现实社会中法律、规章和规范的局限性，无需人为的约束和监管。神秘性是指民间信仰一方面用超乎理性的方式解释个人事件，另一方面将监视作用的主体认定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鬼神、魂魄等），并对个人形成一种威慑作用。基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民间信仰在维持个人遵守社会秩序、认同道德规范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 （二）鼓励与暗示效应

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常说“好人有好报”，这实际上表达了民间信仰在道德教化机制中的鼓励与暗示效应。鼓励效应主要是指民间信仰追求的动机与结果的一致性，从动机的角度来说，个人通常在信仰过程中展现出实用性的一面，即期待通过信仰的行为能够带来对个人更大的利益，即寻求“好人有好报”的结局。反之，如果“作恶”的话则会遭到报应。与鼓励效应相配合的是暗示效应，正所谓“心诚则灵”。不管是“好人好报”，还是“作恶遭报应”，其前提是个人对信仰的“诚心诚意”。进一步分析，“好人有好报，作恶会遭报应”既吸收借鉴了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同时也融合了民间社会的朴素的认识。“好人有好报，作恶会遭报应”，看似是一种“功利主义”，实际上是追求“德福一致”的理想状态。在普遍的伦理规则的指导下，“德福一致”是个人道德生活中的一种完满状态体现，即主要是作为德性的道德对于同一的主体而言的德性与幸福之间的一致关系，就是说，一个人越有德性就越幸福。《大学》有言：“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10] “自由-自在”的民间社会正是通过个人简单的利益计算的方式，既能让个人过上内心充盈的日常生活，又能让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伦理秩序良好的状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信仰同样起到了道德教化的功用。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来说，民间信仰的鼓励与暗示效应是对“自然后果法”的延伸。卢梭（J.J.Rousseau）在《爱弥儿》中主张对儿童不要采用说教或体罚的方式，而是要让儿童体验不良行为所带来的后果。[11]民间信仰中所展现的鼓励与暗示效应同样也是在解释所有的个人行动都会有一个自然的后果，如果是行善就会有一个好的后果，如果做恶就会有一个坏的后果。好与坏之间的区分，主要还是针对个人的利益而言。从反方向来看，普罗大众还容易从后果反推原因，其中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和神秘色彩。如，个人的成就被推定为祖先的庇护（“祖坟上冒青烟”），家庭中遭遇不测被推定为前世的祸根（“上辈子做的孽”）。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自然后果法”的实质内涵。

# 三、余论：信仰教育再认识

总体而言，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作用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标准化的教育方式”。现代学校德育承袭了现代教育的制度化的特点，在目的层面上表现出高度的计划性，在内容层面上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在结果层面上表现出高度的标准化。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结果意义上的展现，其过程与现代学校德育截然不同，是因为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是普通民众生活中的自然流露。现代德育与日常生活的脱节问题之所以成为诸多学者批判的重点，这也是原因之一。如何在现代学校制度的背景下关照民间信仰的现实问题？如何在确认民间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后，重新认识信仰教育的问题？这都是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民间信仰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一，现实中的道德教育过多拘泥于日常行为规范的授受。有学者曾对德育内容划分了三个级态，即日常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原则和信仰价值追求。[12]当前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学校道德教育过程中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对于儿童的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上，甚至一度在国家层面上出台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之类的规章制度作为学校德育的主要内容。事实上，在日常行为规范之上还有伦理道德原则和信仰价值追求两方面更高层次的内容。过多重视日常行为规范，或者将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等同于全部的道德教育，显然是不合乎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通过对民间信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民间社会虽然也关注日常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但是同时在伦理道德原则和信仰价值追求方面同样有所作为，尽管有些内容和要求上依然值得商榷。因此，在学校道德教育中，需要注意到道德教育内容的分层问题，需要重视更高层级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信仰价值追求。

第二，要正确认识民间信仰。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关注民间信仰的积极功用，二是要正视民间信仰的多元驳杂。首先，要认识到民间信仰在历史长河中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民间信仰之所以能够千百年来延绵不绝，主要是因为民间信仰维系社会道德规范、支撑伦理生活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民间信仰是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构建起个人信仰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个人社会化和道德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要正视民间信仰的丰富驳杂。民间信仰的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不能简单地将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等同，也不能轻易地评价某一民间信仰的价值。当下，不少的民俗活动（包括民间信仰在内）被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认定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宣传，这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续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增强民俗活动的影响力。但是，民间文化自身具有自由自在的特性，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尽管《论语》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13]但民间大众对于鬼神的信仰就从未终止。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上海文学，1994（1）：68-80．
2. 王光东．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4．
3. 朱海滨．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民间信仰[A]．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民间”何在 谁之“信仰”[C]．北京：中华书局，2009：54．
4. 《礼记·曲礼》
5. 《汉书·郊祀志上》
6. 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俗研究，2007（1）：5-15．
7.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5．
8. 向松柏．传统民间信仰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51．
9. 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24．
10. 《大学·第十一章》
11. 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107-108．
12. 檀传宝．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9．
13. 《论语·述而》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3级博士班；

联系电话：18710194354

电子邮箱：linaitao1988@163.com

1. \*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科研基金项目“非制度化德育：民间德育探析”（项目编号：15-03-03）研究成果。 [↑](#footnote-ref-1)
2. \* 作者简介：李乃涛，（1988— ）男，山东阳谷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教育基本理论和德育原理。 [↑](#footnote-ref-2)
3. 本文中探讨的“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化”均基于中国文化的背景，特此说明。 [↑](#footnote-ref-3)
4. “自由-自在”借鉴了陈思和、王光东的研究，在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一文中，提出了“自由自在是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的论点；在王光东《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一书中，解释了“民间的核心内涵是自由-自在”的具体内容。参见：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J]．上海文学，1994（1）：68-80．；王光东．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4． [↑](#footnote-ref-4)
5. 部分研究者将这一特点归结为民间信仰的“功利性”，而功利性容易与西方哲学中的“功利主义”混淆，笔者更愿意借鉴李泽厚“实用理性”的说法，认定为民间信仰的实用性。 [↑](#footnote-ref-5)